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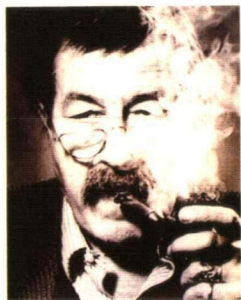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回忆录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Günter Grass | Beim Haken der Zwiebel

剥洋葱

回忆就像洋葱
每剥掉一层
都会露出一些
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
泪湿衣襟



〔德国〕君特·格拉斯 著
魏育青 王滨滨 吴裕康 译



剥洋葱

[德国] 君特·格拉斯 著
魏育青 王滨滨 吴裕康 译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Günter Gras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德)格拉斯著;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447-0376-5

I. 剥… II. ①格… ②魏… ③王… ④吴… III. 格拉斯, G. —回忆录 IV.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1446号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by Günter Grass

Copyright © 2006 by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eidl Druckerei und 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027号

书 名 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

作 者 [德国]君特·格拉斯

译 者 魏育青 王滨滨 吴裕康

责任编辑 陆志宙

原文出版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83千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376-5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曾给予我教益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层层叠叠洋葱皮 /1
第二章	深藏不露 /27
第三章	他的大名是“这事咱不干”/61
第四章	我如何学会了恐惧 /99
第五章	请客吃饭 /147
第六章	井上井下 /183
第七章	第三种饥饿 /223
第八章	我如何成了烟民 /261
第九章	柏林的空气 /305
第十章	癌症无声地袭来时 /327
第十一章	我得到的新婚礼物 /353

第一章



层层叠叠洋葱皮

无论是现如今,还是在前些年,用第三人称把自己伪装起来,这始终是一种诱惑:当“他”快十二岁,却还眷恋着母亲的怀抱时,某些事即将开始,某些事已结束。但是,那些开始,那些结束,能精确地说到某个时刻吗?只要是涉及到我的,就能。

在斗室狭窄的空间里,我的童年结束了。当时,在我长大的地方,前后左右同时爆发了战争。战争震耳欲聋地开始了,在“定期班轮”架满火炮的船舷边^①,在向波兰军事基地西沙洲对面的市郊港口“新航道”飞来的俯冲轰炸机声中,还有远到争夺但泽老城中波兰邮局的装甲侦察车瞄准目标的射击声,近到从我们的收音机,也就是从放在客厅餐具架上的“人民接受器”^②里传出的广播声:这些钢铁般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朗福尔区拉贝街一幢三层出租公寓的底层住宅里宣告,我的童年结束了。

① “定期班轮”为一战时的术语,此处指海上布阵的舰只。

② 纳粹时期几乎每家必备的、不能收听“敌台”的廉价收音机。

甚至连具体钟点也永远留在记忆中。从此刻起,这个自由国家^①离巴尔干巧克力厂不远的机场就不再仅供民用了。从出租公寓的小天窗往外看,只见自由港口的上空升起了一阵阵黑烟,随着不间断的攻击和从西北方吹来的微风,散而复聚,去而复来。

远处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艘参加了斯卡格拉克海峡^②战役的老舰退役了,现在只能用作军校的训练舰。飞机发出有层次的噪声,人称“俯轰”,因为它在战地上空侧着身子俯冲下来,发现目标,投掷炸弹。一旦去回忆这炮声和噪声,便会有这样的问题萦绕在脑中:我从长出乳牙、换了恒牙后遭遇的一切,早都随着进学校的日子、打弹子的儿戏和结了痂的膝盖,随着最早的忏悔秘密和以后的信仰痛苦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纸条,这些废纸条从此之后就尾随着一个人,他刚被写到了稿纸上就再也不愿意长个儿,用尖锐的歌声击碎各种形状的玻璃器具,手里拿着两根小木棍,因为他的铁皮鼓而名声大噪,此后就在书的封面和封底之间供你引用,天知道要在多少种语言中获得永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回忆童年,要去回忆如此确定、难以改期的童年末日?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加以补充。因为有些东西会吵吵嚷嚷地缺席。因为前车已然倾覆,我后来才亡羊补牢,因为我无法遏制的成长,因为我与失物的对话。还有个理由不得不提:因为我要说出最后的话。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

① 指但泽,当时国际联盟对该城的称呼。

② 丹麦和挪威之间的海峡。

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

第一层洋葱皮是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接着就是第四层第五层在窃窃私语,等待上场。每一层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字符,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洋葱从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于是便唤起了好胜心:这些草书必须辨清,那些密码必须破解。于是就驳斥了那些个都硬说自己是真理的东西,因为谎言,还有它那位名叫“作弊”的小妹,经常充当回忆中最靠得住的部分;回忆落在白纸上写成黑字后就显得可信,吹嘘自己的细节像照片一样历历在目:我们出租公寓的后院里搭了个棚,油毛毡棚顶在7月的酷热中闪闪发光,在无风的时候发出一股麦芽止咳糖的气味……

我的小学老师是施波伦豪尔小姐,她的衣领是赛璐珞做的,可以刷洗,总是扣得那么紧,脖子上总是留下一道道勒痕……

星期天,女孩们站在索波特海滨的木栈桥上,头上系着蝴蝶结,警察小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曲子……

我的第一只蘑菇是牛肝菌……

当我们学生因为天气太热而停课……

当我的扁桃腺又开始发炎……

当我到了嘴边的问题又咽了下去……

洋葱有好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

但泽及周边地区的夏末,天气持续晴好。战争爆发了,西沙洲的

波兰守军抵抗了四天^①刚刚投降，我就在郊区港口“新航道”——乘坐有轨电车经过萨斯佩和布勒森很快就能到那儿——捡了一大把炸弹和榴弹的碎片。在那段时间，战争似乎只在特别广播节目中进行，小男孩，那个好像是我的小男孩，用捡来的这些弹片换邮票，换五颜六色的香烟画片，换读烂了的或刚印好的书，其中包括斯文·赫定^②的《戈壁滩游记》，天晓得还换了些别的什么。

回忆得不清晰，有时反倒能更接近真实，尽管只是近了一根火柴棍那么点儿距离，尽管绕了不少的弯路。

和我的回忆发生摩擦的东西，大都能撞伤我的膝盖，让我事后感到阵阵恶心：瓷砖壁炉……后院里拍地毯用的棍子……夹层里的厕所……阁楼上的箱子……鸽子蛋大小的一块琥珀……

或是母亲的发夹，或是炎炎夏日里父亲在四角上打了结的手帕，或是形状不一、具有特殊交换价值的锯齿形榴弹片和炸弹片——谁还保留着这些东西，谁就会想起一些比生活来得更真实的故事，即使只是作为让人轻松的借口。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收集画片，乐此不疲。画片可以用有价票证去换，有价票证放在母亲装烟丝的小袋子里。商店打烊后，她总是卷支烟，把“小棍儿”——她把自己这一小小恶习的帮凶叫做“小棍儿”——的一头敲实。每天晚上，她都要喝着君度酒^③隆重地享受这一恶习，心情好的话，还吐上几个袅袅的烟圈。

让我心驰神往的画片色彩斑斓，再现了欧洲画坛上的杰作。所以，我很早就说得出美术家乔尔乔涅、曼坦尼亚、波提切利、吉兰达约和卡拉瓦乔的大名，虽然发音不准。一个躺着的女人裸露着后背，一

① 本书出版后，格拉斯在翻译研讨会上建议将“四天”改为“七天”。

② 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瑞典地理学家。

③ 一种口味独特的橙皮酒。



个长翅膀的男孩替她拿着镜子，这场景从我的童年起就和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字姻缘相连。在杨·凡·艾克笔下的《吟唱天使》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位于画面最后方的那个天使的身影，我巴不得像他，或者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那样有一头髻发。我向这幅挂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里的丢勒自画像发问：为什么这位大师要画自己戴着手套的形象？为什么他那顶怪帽子和右下方灯笼袖上有如此醒目的条纹？是什么令他如此自信？还有，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年龄——他当时才二十六岁——写在画上的窗台下面？

今天我知道，是汉堡巴伦费尔德区的一家香烟画片服务公司提供了这些可用有价票证来换的美轮美奂的复制品。如果有人订货，该公司还提供四四方方的相册。我认识一个美术品商人，他在吕贝克市的国王街开了家古画店，靠他帮忙，我又把上述三位大师的作品都弄到了手，从此就毫无疑问了：这本 1983 年版的文艺复兴画册一共印了四十五万份。

我一页页地翻阅，翻着翻着眼前出现了自己当年在客厅桌上往相册里贴画片的情景。这次贴的是晚期哥特式作品，其中有希尔罗尼穆斯·博斯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圣安东尼的周围尽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黄色管装的雕牌胶水刚开始往外冒，一种几乎是节日般的气氛就逐渐弥漫开来……

当年的许多收藏家也许因为太迷恋艺术了，所以都没命地吞云吐雾。我却从那些不在乎有价票证的吸烟者身上得了好处。收集，交换，贴进相册，归我所有的画片越来越多，我充满童心地、后来又善解人意地对待自己的这些财产：比如帕米奇安诺的《长颈圣母》，圣母细长的脖子上冒出一颗小脑袋，高度超过了背景上直指苍天的立柱，她允许十二岁的男孩像天使一般无比亲密地抚摸她的右膝。

我生活在画片中。因为做儿子的坚持香烟画片的收藏要全，所以母亲不仅捐献出了自己比较有限的享受——她虔诚地用金烟嘴抽中

东香烟——带来的收获,而且还捐献出了这个或那个对她有点意思、对艺术却无所谓的顾客在柜台上塞给她的有价票证。父亲是所谓“殖民地货物商”,出外办货有时会给儿子带些颇为热门的有价票证回来。祖父是木工师傅,他手下的伙计也拼命抽烟,这对我非常有利。那些相册可能是圣诞或者生日礼物,高深莫测的解说词之间留着大量空白。

最后就有了三本相册,三本我视若至宝的相册:蓝相册里贴着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红相册向我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金黄色的相册不完整地收藏着巴洛克时期的图片。让我苦恼的是,给鲁本斯和凡·戴克留下的位置却仍然空着。后继无货,补给不足。战争爆发后,有价票证的来源大不如以前了。吞云吐雾的平民成了离乡背井抽着朱诺牌或R6牌香烟的士兵。我的一个最可靠的供货人,啤酒酿造股份公司的马车夫,在争夺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阵亡了。

其他系列也开始流通了:动物、花卉、德意志历史的靓丽画面,还有影星们涂脂抹粉的脸蛋。

此外,开战后每家都发了食品卡,烟草制品根据特殊联票定量供应。但我在战前就托了雷姆茨玛制烟厂的福积累了自己的美术史知识,所以这种官方规定的匮乏局面对我的影响并不严重。有些空白后来也都填补上了。我有两幅拉斐尔的德累斯顿圣母像,用其中一幅换来了卡拉瓦乔的爱神,这笔生意后来才被证明是值得的。

我还是个十岁孩子时,就能一眼辨认出人称“格里恩”的汉斯·巴尔东格和格吕内瓦尔德、弗兰斯·哈尔斯和伦勃朗、菲利波·利比和奇马布埃之间的区别。

《玫瑰丛中的圣母》是谁画的?那位戴着蓝头巾、抱着孩子、拿着苹果的圣母又是谁画的?

我让母亲考问我,她用两个手指按住了画的标题和画家的名字。

做儿子的回答百发百中。

无论是在家里这样猜哑谜，还是去学校上美术课，我总是得“优”。但从中学一年级开始，课程表上多了数学、化学和物理，情况就不妙了。我心算还行，但是一写到纸上，那些二元方程式十有八九就解不开。直到中学二年级，我的成绩全靠语文、英语、历史和地理这些科目得的“优”或“良”支撑着。虽然，我全凭想象或实物写生的炭笔画和水彩画屡屡博得夸奖，这对学生来说是一桩好事，但是，中学三年级的成绩单上开始有拉丁语分数，于是我完蛋了，只得和其他留级生一起，把这些玩意儿又都重新啃了一年。这使得父母忧愁不已，我自己倒没什么，因为对我来说，天晓得能通往哪个好地方的紧急通道早就敞开着了。

如今当了祖父，我承认自己当年有点懒，但也有点上上进心，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个好学生。这样坦白交待，试图安慰自己那些苦于成绩差劲、老师无能的孙辈们，可惜效果并不明显。孙辈们唉声叹气，似乎不得不拖着按教育标准衡量过的大石块^①往前走，似乎必须在罪犯的流放地度过中学时代，似乎正在美妙无比地打盹却受到了学习压力的侵扰。不过，当年校园里的恐惧从来没能使我的睡梦变成沉重的噩梦。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戴上中学生的红校帽，还没开始收集香烟画片。只要看来又会是一个无止境的夏天，我就会在但泽湾的某处海滩上用湿漉漉的沙子堆城堡，塔楼高低不一，四周还有围墙，里面住着幻想中的生灵。沙堡不断受到海水冲刷，无论堆得多高，都会无声无息地坍塌。然后，湿漉漉的黄沙又开始流过我的指缝……

《堆起的沙堡》^②是我的一首长诗的标题，写于 60 年代中期。当时

① 与格林童话《狼和七只小山羊》有关。童话结尾时狼的肚子里被塞满了石块。

② 格拉斯该诗的标题暗指但泽。

我四十岁,是有三儿一女的父亲,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已经奠定。第一本小说的主人公和作者都出了名,他把自己双重的自我禁闭在书里,绑上了书市。

那首诗谈到了我的出身,谈到了波罗的海:“原籍是堆起的沙堡,东临……”还提出了问题:“何时,何地,为何而生?”虽然句句不全,但是滔滔不绝地展示了损失,唤起了记忆,俨然成了失物招领处:“海鸥并不是海鸥,而是……”

那首诗以圣灵和希特勒的形象划定了我当年生活的范围,以弹片和炮火唤起了对开战初期的回忆。诗结尾时,童年岁月成了淤塞不前的河流,只有波罗的海还在用德语、波兰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战争开始后没几天,母亲的表弟,也就是邮递员弗朗茨表舅,加入了保卫黑维利乌斯广场边上的波兰邮局的行列。战斗转眼就结束了,遵照德军的命令,还活着对手几乎都被军法处置,就地枪决了。论证、宣布和签署死刑判决的那个战地法官,在战后却毫发未损,继续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当法官,判决、签署判决书。在阿登纳总理老不见结束的执政期,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后来,我在书中对参战人员作了调整,以便波兰邮局保卫战能迎合某种叙事方式。我这样使纸牌搭起的楼阁^①轰然坍塌,词语横飞;但是当年我的家人却讳莫如深,他们再也不谈突然消失的表舅了。表舅由于与政治无关,或者说尽管与政治有关,但仍然很受人欢迎,星期天经常带着孩子伊姆加德、格雷戈尔、玛格达和小卡西米尔过来串门,喝咖啡,吃蛋糕,或者下午来和我父母一起打斯卡特牌。可是现在他的名字没人提了,似乎他从未存在过,似乎涉及他和他家人的一切都不可言说。

① 《铁皮鼓》里就有关于纸牌屋的描写。

母亲来自卡舒贝地区的亲戚以及他们不知叽里呱啦说什么的热闹劲儿似乎都——被谁？——咽进肚里不见了。

连我也没有再三提问，尽管随着战争的爆发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或者说，我不敢提问了，因为我不再是孩子了？

难道像在童话里那样，唯独孩子才提得出正确的问题？

莫非我是因为害怕得到一个颠倒黑白的回答，所以干脆就不提问了？

这是不愿张扬的耻辱，就在那个稀松平常、随手可取、能激活记忆的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我写这种耻辱，写这种尾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那些难得一用的词语进入了亡羊补牢的程序，而我时而宽容、时而严厉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个男孩身上：他穿着露出双膝的短裤，跟在秘而不宣的一切后面打探，却仍然未能说出这三个字：为什么？

男孩即十二岁的我，被现在的我盘问得尴尬万分，无疑无法招架。我在加速消逝的当今，在楼梯上每跨一步都要权衡斟酌，我的呼吸都能听得见，我听见自己在咳嗽，能多快活就多快活地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

表舅弗朗茨·克劳泽被枪毙了，抛下了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有比我大的，有和我同龄的，还有比我小两三年的。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玩了。他们不得不从鱼贩子集居地的老城公家住宅里迁出，搬到乡下去，母亲在楚考和拉姆考之间有一个雇工棚和一块耕地。我那邮递员表舅的孩子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那里，生活在丘陵起伏的卡舒贝地区，忍受着老年常见病的煎熬。他们的回忆和我的回忆大相径庭。他们没有父亲，而我的父亲不离左右。在这蜗居里，他离我实在太近了。

这就是我的表舅，波兰邮局的职员，他胆小怕事，爱操心，很顾家，并不生来就是视死如归当英雄、后来说名字用波兰文镌刻在纪

念铜牌上永垂不朽的料。

1958年3月^①，我费了些周折弄到了波兰签证，从巴黎经华沙到了格但斯克这座在废墟中重建起来的城市，寻找昔日但泽的遗迹。在断壁残垣的背后，在布勒森的海滩上，后来又在市图书馆的阅览桌上和未被战火摧毁的裴斯泰洛齐学校附近，最后在两位幸存下来的邮局职员家的卧室兼厨房里，我发现和听到了足够的小说素材。然后，我下乡去拜访还健在的亲戚。在那里，在一座小茅屋门口，我受到了被枪杀的邮递员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舅婆安娜的欢迎。她口音浓重，说了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啊，小君特，你长大了！”

在她这样欢迎我之前，我必须先消除她的疑虑，按她的要求出示护照，我们变得像外国人那样陌生了。不过，她接着就领我去了她原先的土豆地，现在这里铺了混凝土，成了格但斯克机场的起降跑道。

第二年夏天，战火已经四处蔓延，成了世界大战，所以我们中学生在放假时不再满足于在波罗的海岸边重温当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还要海阔天空、夸夸其谈地议论一些境外的大事。我们的话题总是集中在我军占领挪威的问题上，尽管一直到6月，广播里的特别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宣称接下来的法兰西战役是迫使宿敌归降的闪电战：鹿特丹、安特卫普、敦刻尔克、巴黎、大西洋海岸……就这样，我们地理课的内容随着国土的扩张而不断地扩充：接二连三，节节胜利。

不过，在下海游泳的间隙，我们钦佩的仍然只有“纳尔维克的英雄”。我们躺在沙滩上，在家庭浴场晒太阳，心里却万分向往能去“遥远的北国”双方激烈争夺的狭湾，多么希望能在那里让自己的躯体洒满荣誉的光斑，尽管假期过腻了的我们身上散发出的是妮维雅润肤

^① 是格拉斯为创作《铁皮鼓》去但泽收集资料的时间。